

古代小说归类的悖论

张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在古代图书分类中,经具有特殊的地位。《汉书·艺文志》把与经风格类似,但不太重要的称为小说,归入诸子略,虽然其中既含有叙事作品,也包含说理之作。四部分类法设立后,史、子两部便有了明显的区别,史部以叙事为主,子部则以说理为宗,所以《隋书·经籍志》将叙事为主的归入史部杂传,说理为宗的则归入子部小说。作为偏爱历史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采取援子入史的方法,把小说归入史部,而不顾其中含有说理的作品。此后的小说以叙事为主,但大多是民间叙事,将其归入史、子均于理不合,这是目录学小说在归类问题上无法解决的悖论。叙述、说理的区分是四部分类法的重要问题,但历代目录学家在给小说分类时,却抛弃了这一小说的本质属性,转而注重小说的地位问题,以子部内容驳杂为借口,给小说安置了一个容身之所,这是为了解决小说归类的难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关键词:小说;史部;子部;叙事;说理

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9-0058-05

章学诚曾道:“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1](P61)} 战国之文无非说理和叙事两类,后世将这两类文分为子和史。虽然说理文和叙事文有明确的分类,但古代学者在具体归类时却往往比较随意,所以经常出现似是而非的现象。我国传统目录学小说在归类时,最核心的问题也在于此——小说如以叙事为主,则应归入史,如以说理为宗,则应归入子。而古代学者却经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看重其叙事一面,时而看重其说理一面,导致古代小说在归类时经常在子、史两者间徘徊。对这一问题,似乎少见有人涉及,所以本文试加以探讨。

一、后人对《汉书·艺文志》小说性质的争论

对于小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

刍蕘狂夫之议也。”^{[2](P1745)} 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3](P1051)} 而鲁迅则对小说采自民间不以为然:“《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4](P14)} 由于《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小说早已失传,我们无法了解当时小说的真实情况,也即这些小说到底是说理为主还是叙事为主。古人对此早就有争论。胡应麟曾道:“《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异,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5](P280)} 胡应麟认为汉代的小说是杂家者流,仅仅稍错以事耳,所以是以说理为宗,但其中会穿插一点叙事。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却道:“小说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书虽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纪事也’,则其书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观《大戴礼·保傅

收稿日期:2019-01-28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旅游广告语言的历时研究(1927-2015)”(17NDJC261YB)

作者简介:张泓(1968-),男,浙江浦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

篇》引青史氏之记,则其书亦不侔于小说也。”^{[1](P1049)}章学诚认为至少《周考》等小说如非《尚书》一类,即为《春秋》一类。“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2](P1715)}则至少其中一部分小说应该是以叙事为主的。

随着西方的文学理论进入中国,今人在探究《汉书·艺文志》所收录小说的叙事或说理特性时,往往会受到现今文学类小说观的影响,比如江璩提出:“‘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稗官者,野史也,则小说家亦与史同出一源。今按《汉志》所录,如《周考》《青史》《臣寿周纪》《虞初周说》诸书,必皆纪述古代之事,补史官所未及,与史无异。”^{[6](P11)}又道:“《汉志》所录《周考》《青史子》《臣寿周纪》《虞初周说》诸书,亦纯然史体,则小说家亦出于史官矣。”^{[6](P27)}蒋伯潜也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以其书名度之,约可分为四类……为野史轶闻之类……为外史别传之类……为《齐谐》《搜神》之类……实寓言之类。”^{[7](P415)}这就更明显是以现在文学类的小说观来设想汉代的小说,认为当时的小说也必以叙事为主。比如《伊尹说》,蒋伯潜就认为“所录故事以人为中心”^{[7](P415)},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宋人王应麟即推测《伊尹说》和《吕氏春秋·本味篇》有关,余嘉锡更明确说:“惟《吕览》之为采自《伊尹说》,固灼然无疑。”^{[8](P272)}而众所周知的是,《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伊尹尽管在用长篇大论阐述如何烹煮美味,其核心要义却是在论说欲食美味必先成天子,欲成天子必先行仁义之道。换言之,这是一篇典型的论说文。《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尽管都已消亡,但从《伊尹说》即可推测有一部分是以说理为主的。对此,鲁迅早就有准确的论述。他在谈到《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家小说时说:“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4](P3)}可见,虽然使用了猜测之词,鲁迅还是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兼有叙事与说理两类。侯忠义则将《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分为三类:“第一类近史之书,包括《周考》《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四种;第二类似子之书,包括《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待诏臣饶心术》《百家》七种;第三类方士之书,包括《皇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四种。”^{[9](P5~6)}他的观点和鲁迅大致类似,仅仅增加了一类方士之书。

综上所述,《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兼有叙事与说理两类似已可成为定论。

二、《汉书·艺文志》为何将小说归入诸子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是采集自民间的言论。百姓的言论比较琐碎,所述内容比较杂乱,既有叙述事情的,也有探讨理论的,根据子部说理、史部叙事的标准,似乎应该将其区分为两部,但班固统一将其归入诸子略,也即子部。班固为何不将小说分为子、史两部?原因很简单,《汉书·艺文志》中并无史部。

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采用七略分类法,把所有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略,其中兵书相当于战略军事,术数相当于天文历法,方技则相当于医学巫术。和四部分类法相比,六艺略相当于经部,诸子略加上兵书、术数、方技相当于子部,诗赋略则相当于集部,而后代非常重要的史部在《汉书·艺文志》中竟然没有单独设立。针对班固不另立史部的原因,后代一般认为当时史学著作太少,没有专门列出独立一部的必要。“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10](P1619)}对此,逯耀东有不同意见,他曾有评价:“《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汉书·艺文志》所以将史部书籍附于《春秋家》,是因为当时史的独立概念还没有形成,经史没有分立,史学只不过是依附于经学下的一个旁支而已。同时汉代认为《春秋》本身就是史,不论在体例和义例方面,都是中国史学最高的原则,又是中国史学的根源。”^{[11](P24)}逯耀东认为汉时经史一家,这种观点章学诚早就有所阐述。章学诚曾将《春秋》和《史记》的关系解释得清清楚楚:“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1](P464)}所以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和经的关系是“以史翼经”^{[1](P463)}。但仔细审视汉时的历史观,我们即可发现,除了上述原因以外,班固不单列史部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李零曾道:“在《汉书·艺文志》中,史书是附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不是单独的门类,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学术。”^{[12](P280)}似乎也认可史书是仅仅附属在《春秋》之后的,但他马上解释:“《汉志》中的史书,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六艺略》的书类(如《尚书》《周书》),一部分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如《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和《楚汉春秋》),一部分在《数术略》的历谱类(如《帝王诸侯世谱》《古来

帝王年谱》。”^{[12](P280)}也即后人对史的认识和汉以前有很明显的区别。“‘史’在西汉以前的传统中,是作为‘天官’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内容远远超过后世所谓的政与事。……实际上,古代的典章制度、档案文书、天文历法、巫祝占卜,都属于史的范畴。”^{[13](P8~9)}史的范围如此之广,班固当然无法将史单独归类。既然经史一体,小说自然不能归入经,所以将其归入子应该说是适得其所,虽然其中也含有叙事的成分在内。由此,学者们给班固的小说归类找到了一个最合理的理由;但这种观念又恰恰是对班固的误解,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后人认为叙事和说理是区别文章的重要标准,以此将其区分为史和子,所以班固也应看重两者的区别;但事实上是班固并不关注说理、叙事等区别,他更看重的是文章的重要性与否。

其实,只要仔细观看班固对史类书籍的归类,即可知班固并没有对叙事和说理格外关注。班固将《史记》《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均收入《六艺略·春秋类》之后,而《列女传颂图》则被收入《诸子略·儒家类》之下。《春秋》以叙事为主,将历史学著作附录在《六艺略·春秋类》之后尚且情有可原,但《诸子略》自然应以说理为宗,将历史附录在《诸子略》之下,很明显于理不合。由此,我们自然得出结论,班固在处理叙事与说理这一后人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时非常随意,在他心目中,经史固然一体,子史照样一体,与其说班固经史不分,不如说他子史不分。涉及到小说时,他甚至根本不关注小说到底是以叙事为主还是以说理为主,而只关注其重要性,所以,小说之所以被归入子是因为其在重要性上无法归入经,而史也同样,其中比较重要的被归入经,不太重要的也被归入子。《六艺略》和《诸子略》的区别仅仅是重要与否,最重要的归入《六艺略》,不太重要的归入《诸子略》,而《诸子略》中最不重要的则是小说。《六艺略》可以将叙事与说理之作兼收,《诸子略》也如此,小说照样如此。

三、唐代的小说归类

汉魏之际,史学逐渐脱离经学、子学,魏晋以后,经史、子史并称的现象很普遍,而到了唐初编撰《隋书》时,史学著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给史学一席之地,《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所有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史部更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杂传等十三类。既然史、子都已各自存在,所以《隋书·经籍志》叙事、说理有了明显的

区分,叙事为主的如《搜神记》等归入史部杂传,而说理为主的如《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张舜徽曾道:“临川《世说》,昔人虽列之子部小说家,而实为记事之作。乃乙部之支流,诸史之羽翼。得刘孝标为之注,缺者补之,误者订之,或阐述其理,或疏论其事,而《世说》之用益宏。唐修《晋书》,采掇过多,容有失于甄别者。若谓一无可取,不当以入史,则非也。”^{[14](P136)}他认为《世说新语》并非说理之作,而是叙事之作,所以应该归入史部,甚至其中的史料是可以采集入正史的。这是一个误解,正如章学诚所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1](P1)}《世说新语》的叙事仅仅是说理的铺垫。其实,只要仔细比较《论语》和《世说新语》,即可发现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世说新语》首列孔门四科,即是对《论语》的因袭,《论语》无论记言、记行都很简洁,而《世说新语》的记载也是如此。骆玉明认为《世说新语》源于子书:“在著作模式上它是源于子书的,尤其接近儒家借故事以说理的类型。”^{[15](P6)}可谓一语中的。《世说新语》很少记事,而以记言、记行为主,以说理为宗,所以《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是严谨的归类。

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对历史是如此偏爱,因为此前修史书时大量采自小说,所以刘知几把小说归入历史,认为小说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将矛头指向以‘小说’为代表的杂家文化,从功能上取消和否定杂家小说的独立文化价值,有选择地收编进入史书文化。”^[16]《隋书·经籍志》把小说归入子,看重其说理一面,而刘知几则将小说归入史,当然就更看重其叙事一面。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历史分为六家、二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榘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7](P2)}“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7](P32)}他明确提出编年体和纪传体是最重要的两种正体。尽管正体只有两类,但在正体史料的采集上则可以兼容并包:“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榘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17](P454~456)}刘知几将这些史料统称为偏记小说,在《史通·杂述》各分类评价中反复强调,这些偏记小说是正史的有益补充:“求诸国史,最为实

录”^{[17](P464)}，“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17](P465)}，“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17](P465)}，“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为言，犹贤于已”^{[17](P459)}。但同时刘知几又对这些偏记小说非常反感，他经常指责“异端”。所谓“异端”，指材料来源于传闻。他认为偏记小说中的民间传说编入正史会使正史的人物形象有所改变，影响正史的真实性。“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难曰：……夫刳尧鄙说，闾巷谰言，凡如此书，通无击难。而裴引《语林》斯事，编入《魏史注》中，持彼虚词，乱兹实录。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17](P869~870)}在偏记小说中，刘知几尤其喜好批评《世说新语》等一些琐言类，几乎对此嗤之以鼻。他对《世说新语》的指责比比皆是，如：“又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17](P395)}之所以经常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论，恰恰是因为刘知几自己混淆了史和子的界限——《世说新语》等琐言类在《隋书·经籍志》中是被归入《子部·小说类》的。既然归入子部，其中的记言、记行都仅仅是最终说理的铺垫，就如同《庄子》中的寓言仅仅是最终说理的铺垫一样，是无法保证其真实的。刘知几认可《庄子》中的内容是可以虚假的，因为《庄子》原本就属于子，其中的叙述是寓言，但嵇康竟然将《庄子》中的叙述当做真实的史实就很荒唐：“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蛙鳖竞长，虻蛇相邻，莺鸠笑而后方，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如此，何为而薄周、孔哉？”^{[17](P774)}但刘知几自己恰恰犯了和嵇康同样的错误，《庄子》属于子部，《世说新语》也属于子部，《庄子》的虚假可以理解，为何《世说新语》的内容不真实就要被指责？刘知几可以指责正史将《世说新语》当作史料，但不能要求《世说新语》必须真实，而将《世说新语》归入偏记小说，认为其是正史补充的恰恰又是刘知几自己。

到了唐代，史和子、叙述和说理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之后，刘知几援子入史的小说观，势必给后代小说的归类带来无法解决的难题。

四、唐以后的小说归类

程千帆曾道：“商、周二代之散文，概括言之，可分记事说理两派。记事之文，大体为经史；说理之文，大体为子书。前者起于商世，后者源于周季。”^[19]但他马上解释：“经史之中，亦有说理，诸子之中，颇多记事，无从严格划分，兹但示其重心所在而已。”^[19]如果说汉代以前人们对叙事、说理并不关注，所以史、子不分尚可理解的话，等到《隋书·经籍志》已经将史、子区分得清清楚楚以后，刘知几还要援子入史，就只能让人理解为对历史的过度偏爱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归入九流十家，其作品兼有叙述和说理两类。而自《隋书·经籍志》开始，小说一直是以议论为宗，被归入子部。刘知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为了扩大历史的范畴，采用了援子入史的方法，将原本归入子部的《世说新语》等书归入史部，但在形式命名上又采用了援史入子的方法，将正史、古史之外的历史均称为小说，如《搜神记》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入史部杂传类，刘知几却将其归入偏记小说。刘知几的影响如此之大，导致后人在小说收录时均以他马首是瞻，只要他收录进偏记小说的均被收录为小说，看重小说的叙事性，而不论其终极目的是否为说理。

唐宋以后，朝廷对史部的要求日益严格，民间叙事已无法进入正史，而街谈巷语的小说很明显属于民间叙事，所以在小说总的归类时，后代的目录学家只能采用《汉书·艺文志》的子部归类法。比如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修《新唐书·艺文志》时，也照样将《搜神记》等归入了子部小说家类，这就使得小说名实不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世说新语》为例，《隋书·经籍志》认为小说以说理为宗，看重《世说新语》的终极说理目的，故将其归入子部。刘知几认为小说以叙事为主，看重《世说新语》的记言、记行的铺垫，故将其归入史部。应该说上述两者尚且都能自圆其说，但唐以后的目录学家均以为小说以叙事为主，也看重《世说新语》的记言、记行特点，但又将其归入子部。由此，我国传统小说在内容上从说理向叙事有了一个重要转变，但在形式上自唐后却一直保存在子部。

唐宋以后的小说已经形成一个悖论——如归入史部，其内容过于琐碎；如归入子部，其表达方式又以叙述为主。可见，无论将其归入史、子均于理不合。两害相较取其轻，相对于史部，子部的内容要驳杂得多，而其重要性也要轻得多，所以目录学家均继

承了班固的子部小说归类——以重要性与否来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小说。这是因为《汉书·艺文志》的巨大影响,更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后代已由七略分类法变为四部分类法,而小说的实质也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如前所述,《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归入诸子略,我们还能以当时并无史部为借口,认可小说中是存在叙事之作的;当《隋书·经籍志》将小说归入子部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小说必须以说理为宗,因为当时史部已存在。刘知几却将《隋书·经籍志》中以说理为宗的子部小说更名为偏记小说,归入史部,认为偏记小说可以补充正史,和正史参行。在后代目录学家的心目中,班固和刘知几成为两座无法跨越的高峰,只能将他们两人的观点模糊地加以统一。

如果将古代的目录学分类法作一个比较,《七略》的六部分类法,史的范畴比后代四部分类法要大得多,尽管其中并没有设立史部;相反,子的范畴则比后代要小得多。江璩对四部分类法似乎不以为然:“以术数、方技诸类附于子部之后,亦无大害。然以之与周秦诸子相较而并观,则渊源各别,拟非其类,而失诸子之真矣。”^{[6](P3)}又道:“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后可以名为子书。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钞胥是务,剿袭相因,亦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子书之体不明,先民之绪遂湮。无惑乎诸子百家之学响沉景绝于后世,而缀学汲古之士所以惕然而惧也。”^{[6](P3)}所以有学者评论:“纵观子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似可分为两个阶段:唐宋以前,子书单纯,名副其实;唐宋而后,子书驳杂,名不副实。”^{[20](P464)}余嘉锡也对四部分类法颇有微词:“限之以四部,而强被以经史子集之名,经之于史,史之于子,已多互相出入。又于一切古无今有、无部可归之书,希举而纳之子部。”^{[21](P161~162)}四部分类法将术数、方技、兵书、天文、图书等内容均归入子部,就使得子部内容显得非常驳杂。如果就此而言,上述评论自然是正确的,但如认为唐宋以前的子书均是说理之作,则很明显是误解,《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即是以重要性来判定,而非以说理为标准。原因很简单,既然《七略》的六部分类法中没有设立史部,叙事之作不是归入经,就只能归入诸子,但正因为子部内容驳杂,才使得小说有了容身之所,因为小说中的叙事之作固然不能列入说理类,但如其归入博物类却是可以勉强为之的;而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除了保留了诸子略中说理的内容以外,还加上了博物类内容,所以,刘知几的援子入史

使得小说没有容身之所的问题总算得以勉强解决。

在四部分类法的归类中,纯粹的叙事文如《左传》归入史部,纯粹的说理文如《韩非子》归入子部,这些都不构成任何问题,不会引起任何争论,但是如《论语》《世说新语》等作品,虽然以记言、记行为主,却又以说理为宗,在目录学的归类中就成了进退两难的大问题。如果说《论语》可以凭借经的地位暂且不论,《世说新语》的归类就成了目录学家的难题。在古代小说的研究中,有关《世说新语》是不是小说的争论也与此不无关系。

总之,我国小说归类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以说理为主,兼有叙事,被归入诸子略;《隋书·经籍志》中的小说均为说理之作,被归入子部;刘知几将叙事和说理之作合称为小说,归入史部;此后的小说以叙事为主,均被归入子部。四部分类法设立之后,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就有两个关键点:一、小说之名与小说之实的问题;二、叙述与说理的问题。只要抓住这两个问题,一切研究都会豁然开朗,而现在研究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与没有抓住这两个关键点有关。

参考文献:

- [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6]江璩.读子卮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7]蒋伯潜.诸子通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 [8]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9]侯忠义.汉魏六朝小说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
- [10]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8.
- [1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 [14]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16]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 [17]刘知几.史通[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8]永瑆,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9]程千帆.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二)[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 [20]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 [2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